

中国农村地区保存传统方言的现状

赵 日 新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

一、 中国的汉语方言使用概况

据《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之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语文出版社 2006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会说普通话人口的比例,全国为 53.06%,城镇为 66.03%,农村为 45.06%。在掌握普通话方面,城市与农村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就是说,只有大约一半中国人会讲普通话。统计数据还显示,56.76%的中国男子会讲普通话,而会讲普通话的中国女子只有 49.22%。在城市居民以及年龄在 15 岁至 29 岁的人当中,三分之二的人能讲流利的普通话,而在 60 岁至 69 岁的年龄组中只有大约 30%的人会讲普通话。

当然,会说并不等于愿意说、敢说、好意思说。

二、 中国农村的方言概况

自从 1956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以来,我国的推普工作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城市的普通话普及程度应该说是比较高了,但是推普活动在农村似乎成效并不大。农村推普难度大,普通话基础还比较薄弱。

1.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是农村人须臾不可离的交际工具

两千多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使得中国农民的交流圈或生活圈包括通婚圈都比较小,有时甚至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特别是在南方山区的农村情况更是如此,各种方言口语之间差异很大,“十里不同音”的现象比比皆是。长期的封闭使中国传统农民形成重土思乡的文化观念,作为文化一脉的方言,也渗进了祖祖辈辈对它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方言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乡土意识和乡土文化的载体。封闭狭小的生活空间,落后简单的交际媒体,也将方言推向至高无上的的使用地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人们重复着熟悉已极的方音,并默默咀嚼着由乡音透露出来的浓浓乡情。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商品经济的大潮对整个中国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观念的改变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实现的。加之大多数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农民还很少走出家门、离开他们世代代休养生息的土地,所以方言的使用对他们的生活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2. 农村人对普通话普遍缺乏正确的认识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一种全国性的交际语言。中国方言众多，且很多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还很大，大多数人从小都生长在方言环境中，掌握普通话需要花时间学习，而且学起来并不容易，这就使人们形成一个误解，以为普通话是文化人的事，是学问人的事，与普通人特别是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农民对推普往往持比较消极甚至是排斥的态度。浓郁的方言情结往往使一部分农村人对普通话持对立情绪，以为推普就是要消灭他们的方言、消灭他们的文化传统。

3. 农村缺乏说普通话的环境

应该说，任何语言都只是一种交际交流的工具，普通话也好，方言也罢，都是因为交际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工具，方言的存在是因为它能满足一定区域内人们的交际需求。随着人们生活圈子的扩大，交际范围的扩大，方言难以满足交际需要时，就要求产生通用的交际工具——普通话。今天的中国农村虽然不再那么封闭，人员的流动已经很频繁，但整体来说，大部分农村还是以人口的流出为主，即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或外出经商。日常交往中主要以当地人为主，方言完全可以满足本地人的交际需求，这就使普通话基本没有存在的市场，也就是说，农村缺乏说普通话的客观环境。

三、 中国农村的普通话教学情况

学校应该是普及普通话的基本阵地，那么农村中小学的普通话教学情况如何？

1、在我国农村地区甚至相当一部分城市的学校中，教师用方言上课的现象并不罕见。比如作为首都的北京市，一向被视为推广普通话的大本营，但据北京市语委进行的中小学普及普通话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不少郊区县中小学课堂上经常出现普通话与方言混杂的局面，学生用普通话朗读课文，却用方言回答问题。在平谷，这部分学生的比例为 34%，而在通州则达到了 38%。

《羊城晚报》(2004-04-23)的一则消息指出，广东农村地区尚有过半数的中小学校用方言上课，粤东、粤西情况尤其突出。就连广州市内也还有 17%的中小学普通话教学尚未达标。

《南方都市报》(2007-05-27)一则题为“广东广大的农村地区，是方言的‘重灾区’”的新闻也指出，在广东的农村地区，粤语、潮汕话、客家话等方言仍然牢牢占据人们日常交流的主导地位，中小学生的思维习惯仍然囿于方言。

有人曾经对闽南地区的普通话与方言使用情况作过调查,结果显示: 98%的学生日常的口语交际用的是闽南话(其余 2%的学生是外来打工者的子女), 因为生活在农村, 闽南话是本地方言, 讲闽南话已成为习惯, 说普通话感到别扭, 而且自己的亲人朋友中有的普通话听不来或不习惯; 大家都说闽南话, 说普通话会被人误解为“阿北仔”(本地人称呼外地人); 经常听闽南歌曲, 看台湾的电视剧, 闽南话较顺口。75%的学生表示课堂上有过普通话听不明白或表达不出的情况。

2、农村中小学教师普通话运用现状

(1) 一些农村中小学教师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普通话水平较低；有些年龄较大的老师，还有着较为浓重的小农意识，存在方言优越感。他们往往认为，采用方言教学对教学效果并无太大的影响，只要学生能听懂自己上的课，学好自己所教的学科就行，所以对使用普通话教学不以为然。“家乡话说惯了，一说普通话就不自在，老师说着别扭，学生听着也难受。”有些地区，普通话还没有成为校园语言，甚至还没有成为教学用语。《教师资格认定条例》虽然把普通话达标列入教师职业准入条件，但“证书一到手，方言又出口”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2) 本土文化或说方言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方言既然是本土文化的载体，就往往被看作是本地身份的象征。农村教师的社会交往、日常生活等语言交流的对象大都是当地居民，主要说当地话，只能使用方言土语交流的社会环境压力很大。置身于这样的社会、学校环境中，教师入乡随俗，用方言教学，便于得到当地人们的认同，也更利于同学生、家长沟通。老教师本来就不标准不规范的普通话由于缺乏学习机会，无法提高普通话水平。就是会说普通话的年轻教师，在社会交往中甚至校园交流中也不愿成为另类。所以一些外地教师没能将普通话加以推广，反而可能很快就被本土方言所同化。

(3) 缺少讲普通话的自信。不少农村教师对自己说好普通话缺乏自信心，缺乏勇气。

四、进城农民工的方言问题

中国有近 9 亿农民。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各地掀起了所谓“民工潮”。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据估算，目前离家外出打工 3 个月以上的农民已达 1.5 亿人其规模比日本总人口还多二千万而且还在以每年 500 万人的速度递增。

据国家语委近期发布的《2006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统计，70%左右的农民工不能熟练使用普通话。在家乡时，他们说普通话的机会很少。进城务工后，语言障碍使他们不能自如地与周围人沟通，影响了与顾客、雇主、同事及其他群体之间的交流，交际范围通常只限于同乡之间。

近期发布的《农民工语言状况》报告也显示，方言是阻碍农民工和城里人交流、沟通的巨大障碍。方言和很不标准的普通话，在很多情况下限制了农民工就业的机会。在一些普遍使用普通话的行业里，他们很难找到适当的岗位。不少农民工只能靠熟人、老乡介绍工作。由于存在语言交流障碍，很多农民工只能从事工作环境封闭、条件较差的工作，工作中与人沟通的能力较弱，有时候会产生误解甚至给工作带来损失。报告说，大多数农民进入都市后，都面临语言障碍问题。因为普通话说不准，在和城里人打交道时，有自卑心理。很多农民工说，他们最怕自己的家乡话和蹩脚的普通话被城里人看不起，所以一旦发现别人听不懂自己说的话，就不愿意多开口。普通话说得不好的农民工，越来越沉默，与人沟通的能力比较弱，

有时还因此产生误会，甚至给工作带来麻烦。

如今，一些地方政府在组织劳务输出时，把普通话列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内容，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但是目前全国接受过普通话培训的农民工仅有 2.35%，大多数农民工的语言学习多以自发学习为主，社会交往是农民工学习普通话的主要途径。经调查显示，进城后，农民工的普通话水平有较大提高。

五、 中国农村地区方言的未来

方言和普通话有着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语言生活多样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的语言观念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从文化层面说，方言兼有传承人文特性，维系乡土情感的作用。推广普通话，规范语言交际工具，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之下，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农村中小学教师普通话水平逐步提高，在农村推广普通话的力度逐步加大，广播电视等媒体的普及以及人们对普通话和方言态度的改变等，都对农村方言造成较大的冲击。农村人口谋生方式的改变——由本地务农转向外地务工，使得农民走出村庄，与不同方言的人开始了频繁的接触，并开始使用普通话。经济的发展和人员的流动，对语言的统一势必产生强大的推动力。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语言（方言）之间的优胜劣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语言自身的因素，而是在于语言背后的社会条件尤其是经济基础。语言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方言如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而变迁，最终消亡，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是语言自然进化的正常历程，是语言发展的自然规律，是人类无能为力的。